

第一章 绪 论

1.1 省区经济的战略地位

本文中的“省区”是一个专用概念，特指中国享有省级管理权限的行政辖区单元，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为了论述方便，统称其为“省区”。由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的经济运行情况与大陆各省区截然不同，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中的“省区”主要指内地 30 个省区。本书研究时段截止至 1996 年，1997 年重庆从四川省划出为直辖市，限于统计资料的滞后性，重庆市仍包含在四川省中。省区是我国现行区域经济管理的一级地域单元，在中国政体结构中，省区上承中央，下启地方，在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中居有独特的地位，中央的一些具体政策大多且必须通过省级政府来实施，省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基础，因而研究省区经济对中央宏观决策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1.1 省区经济与地方经济

地方经济是与中央或全国经济相对应的一个通类概念。地方的概念就是指某一特定的区域，是整体空间的一个部分或部位，是全局中的局部。从这一意义上讲，省区经济属于地方经济的范畴，但一个省区的区域空间范围较大，所以一些文献也把省区经济称之为“地区经济”。

地方因其范围有大有小，具有层次性。一个省区是一个地方，

一座城市亦是一个地方，一个县甚至一个乡、一个镇也是一个地方，这些构成了地方的等级体系。地方经济，不仅包括投入地方经济活动的自然资源要素诸如矿藏、土地、森林、水、生物等以及开发利用与加工这些资源的工厂、农场、矿山等生产组织，还包括政府、其它各类企业、家庭居民、私人 and 公共机构等，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构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空间经济系统，这种体现地方特色的空间经济系统是动态的实体。对其动态考察认识集中在经济活动中三个基本事实的基础上^①：①自然资源优势；②集中经济；③运输和通讯成本。用现代区域经济学的学术语言表达，三个基本点又明确表示为：①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②要素的不完全可分性；③商品、劳务、信息的不完全流动性。它们构成了“地方经济利益”关系的网结。

在现代中国地方经济等级系统中，省区经济是最高级别的经济系统，是地方利益的最高级表现形式。省区拥有相对独立的具有竞争实力的产业体系以及中央赋予的辖区内地方经济宏观决策调控能力、投资权限和财税能力。通常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地方”主要指“省区”这一层次，因而省区经济是地方经济的集中代表。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首先要处理好中央与省区的经济利益关系，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事关成败的重大问题。

1.1.2 省区经济与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与地方经济在概念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主要是空间范围和规模大小的差异，范围较大的地方称“地区”，一个地区就是一个“区域”。地区经济就是区域经济。

科学意义上的区域经济通常是指经济区域的空间组织或称“经济区域系统”，也称“空间经济系统”。根据区域空间尺度范围大

[美] C·M·胡佛等，区域经济学导论，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小，区域经济也是具有层次级别的系统体系。全球尺度的区域经济称为国际经济；跨国跨地区的区域经济有的称共同体，有的称圈，有的称带；国家内部也可根据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划分为带、经济区，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体系。迄今为止，根据中国幅员辽阔和区域差异，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们把中国划分为经济地带→经济区→基本经济区→基层经济区，并作为制定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空间依据。

在若干探讨中国经济区划体系的方案中，南京大学宋家泰先生主持编著的《中国经济地理》将全国经济区划体系划分为五级：全国基本经济区（省区组合）—省级经济区（可能有调整省区界线的问题）—地域经济区（省内县的组合）—县域经济区—县以下主要乡镇经济区（乡组合），这种不同层次的经济区组织模式是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科学战略地域部署。在这种经济区划的等级系统中，以省区为单位的经济区具有重要的组织实践意义。实际上“我国省级行政区基本上是一级完整的经济区，各省都有较大的经济中心（一般也都是行政中心），工、农、商业通过交通运输与流通渠道组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经济网络，构成为省级行政—经济区，具有强大的‘传递’和‘发动’双重功能。”^②一方面，它通过省级行政系统把中央的经济运行指令和决策向下传递，也把地方的经济情况反馈给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它通过行政手段发动其所辖区域内的经济运行，组织省域内的经济区划体系，推进省区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无疑省级行政—经济区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纵观我国经济区组织的实践过程，以省区组合经济区实践的成功个案并不多，一方面这种经济区的组合是人为划定（带有理论

宋家泰主编《中国经济地理》，中央电大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275页。

刘君德，《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探讨和主观理想色彩)，若干省区组合在一起并不是这些省区自发愿望 缺乏自动力 另一方面 经济区组织运行缺乏决策行为主体，有谁来承担经济区发展的重任？相反，以省级行政区为单元的省区经济在改革开放 18 年来却表现了极强的发展活力，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发展模式，使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们精心编绘的经济区划图像黯然失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过程中，省区经济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作为我国区域经济组织的重要空间模式进一步发挥着主导作用。

1.1.3 省区经济与中央经济

“中央经济”是与“省区经济”相对应的全国经济 属宏观经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不平衡，在这样的国度内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如何实现国民经济持续 协调发展 加速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是“中央经济”着重要解决的主要课题。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从 1996 年至 2010 年这一阶段，全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目标是“2000 年在我国人口将比 1980 年增长 3 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 基本消除贫困现象 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和经济体制基础。”这些代表着目前以及走向 21 世纪最初十年全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方向。

中央经济确定的目标及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对全国经济运行具有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

化 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 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宏观调控以间接方式为主，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手段并用，结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 重点是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制约 能够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的机制，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保持全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省区经济是中央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部门经济相互交织构成全国经济统一整体。从搞活省区经济的角度看，赋予省区必要的经济管理权限，让省区有更多的因地制宜的灵活性，发挥省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增强中央经济的生机和活力。从中央经济角度看，全国经济发展目标实现总是要落实在省区经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在维护中央宏观经济调控权集中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省区经济的活力与灵活性、创造性，才能使全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1.2 中国省区经济研究的进展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急剧转型，经济实力稳定增长，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日趋富裕，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成功实践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

1.2.1 海外学者对中国省区经济的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广泛，特别是中国成为一些有影响的世界经济组织的成员国后，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的研究空前活跃和深入。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对中国经济的研究，除了接受政府和有关经济组织、团体的委托，为他们的决策提供咨询、进行可行性分析以外，还在于第一 中国是一个不发达的大国，它从传统经济走向现代化经济的过程、经验和规

律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和模式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第二，中国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而大多数经济分析工具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这些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总结，许多西方经济学者试图把西方的理论运用到中国经济分析中来，以进一步分析和扩充西方经济理论的体系和应用性；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美籍经济学者邹至庄教授所说：“经济学家常常妒忌自然科学家，因为自然科学家有能力强进行人工控制下的实验，而在经济中很少有这种机会。中国政府实际上在经济中进行了一些重要的实验，我们不应该失去研究这些实验结果的机会。”^①基于这样的目的，一些海外学者和中国学者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甚至多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同中国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富有意义的成果。

较早对新中国地区经济格局进行研究的是澳大利亚学者奥·唐尼索恩，他于1972年第一个用“蜂窝状经济”的概念概括了当时中国经济呈现分割化趋势的特征。^②此后，海外许多专著和论文在讨论中国经济是否是“蜂窝状”结构，地方与地方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进一步走向集中还是分散等问题，都提到“蜂窝状经济”这一论断。美国学者托马斯·P·莱昂斯对中国经济分割化趋势从体制的角度进行了剖析，指出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流通和分工合作关系被地区间的分界切断，造成资源利用的低效率以及严重浪费现象，这是由中国的计划体制造成的。中国经济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个子块，计划内又分为中央计划

邹至庄，中国经济，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1~2页。

^② Audrey Donnithorne. China's Cellular Economy; Some Economic Trends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December 1972, No. 52, p. 605~619.

和地方计划两部分，分别由中央各部门和省级计划机关组织实施，这种计划体制必然导致中国经济的分割化。

中国地区工业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亦引起海外学者的广泛兴趣。澳大利亚学者郭益耀在他的《中国的新工业化战略》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工业的实绩，工业在地区间的分布和技术变化，用了较多的篇幅讨论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地区问题，揭示了地区间工业分布的不平衡性：即沿海地区工业的繁荣与西北、西南内地工业的相对落后所形成的地区间经济鸿沟，这既是历史存在，又是现实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②郭益耀还讨论了 1979 年～1983 年中国农业新政策所带来的新变化，指出农业水利设施失修，会给农业长远发展带来消极影响。^③另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安德鲁·沃森和他的同事们对中国农村改革第二阶段所暴露出来的地区利益冲突予以较大的关注，^④他们以中国“羊毛大战”为例揭示了地方政府试图控制已经非中央化了的羊毛市场体系以及商业机构和加工厂商在充满着投机和利润的市场上竞争羊毛的行为，分析了“羊毛大战”的起因以及所暴露的羊毛加工企业之间以及羊毛产地和加工地之间地区利益矛盾，指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仔细谨慎地管理价格体系和市场网络，协调好羊毛加工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利益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这些不仅同乡村改革有关，而且同整个改革进程，同政治抉择有关，见地十分尖刻。

① Thomas P. Lyons. Explaining Economic Fragmentation in China: A System Approac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0, p. 209~236(1986).

② Y. Y. Kueh. The Maoist legacy and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The China Quarterly*, Special Issu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40 Years" 1989, p. 420~447.

③ Y. Y. Kueh. "China's New Agricultural-policy Program: Major Economic Consequences, 1979~1983",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8, 353~375(1984).

④ Andrew Watson, Christopher Findlay, Du Yintang, "Who Won The Wool War? A Case Study of Rural Product Marketing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18 (213~241), June 1989.

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另一个兴奋点是如何看待中国发展与强大以及所带来的环境和地缘政治问题。美国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 D·H·帕金斯在《中国能成为亚洲下一个经济巨人吗?》一文中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关注着中国的发展。^①他认为 18 世纪后期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扩展到欧洲的其他国家和北美,花了 150 年的时间,才使约占世界人口 17% 的 7 亿人口极大地提高了生活水平;即使包括苏联在内,也只占世界人口的 23% 左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使差不多 2 亿人口告别农业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如果中国在 20 世纪末或 21 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变成工业国,就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处于工业社会的人口比 50 年代多了整整 11 亿。这样只经过 40 年或 50 年的努力,这个世界就将由四分之三左右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的农业社会转变到有二分之一左右的人口生活在繁荣的工业化社会中。考虑到东亚和中国的收入分配相对平等,那么经济发展就会对大多数人有益,而不是只有益于少数人。东亚和中国的发展意义还表现在它使许多国家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的道路。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只能使它们愈加贫困和落后;要高速增长,就要尽可能少地参与美国、欧洲的经济联系。当时发展的主要模式是苏联的自给自足的集中计划经济。但是以后东亚实行外向型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开放政策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由于发展经济需要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中国发展的意义还表现在缓和了亚洲的地区冲突,中国正变成和平和稳定的可靠力量。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出口的增加,虽然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速度惊人,但占有的世界出口额比重并不大,对西方世界市场的威胁并不很大,由于面临竞争,西方产业和

^① Dwight H · Perkins. China; Asia's Next Economic Giant? Uniu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6.

厂商也需要及时调整，如不调整，就会面临倒闭和失业的危险。此外，新加坡经济学家黄朝翰教授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开放同亚太经济区一体化的关系，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对亚太经济区的长远发展和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对某些国家带来的竞争性。但这些研究较少涉及中国内部的地区经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省区经济发展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关于中国地区发展差异，世界银行的一项报告认为，将中国划分为三大地带过于粗糙，以至于无法进行政策分析。该报告将中国划分为 7 个地区：远西部（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北部内地（黑龙江、吉林、内蒙古、陕西、山西）、南部内地（四川、贵州、云南、广西）、中心部（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北部沿海（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东部沿海（江苏、上海、浙江）、南部沿海（福建、广东、海南）。按 1992 年人均 GNP 指标分析，最富裕地区是东部沿海（781 美元），最贫穷的地区是南部内地（294 美元），最富地区与最穷地区人均 GNP 之比为 2.6 倍，地区人均 GNP 总体相对差异系数为 37.4%。这一分析比按东、中、西三大地带分类方法了解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情况要细致得多了，但观察样本还嫌大，除远西部之外，所有地区人口均超过 1 亿人，其中中心部达 3 亿人，南部内地、北部沿海总人口都在 2 亿人以上，面积和人口均相当于世界上的一个或几个国家，仍难以反映中国地区差距的真实状况。

1.2.2 国内学者对中国省区经济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中国省区经济研究是从中国区域经济或地区经济的角度介入的。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区域差异与地区发展战略问题；二是地区经济结构与地区分工问题；三是区域政策

问题；四是生产力布局与区域规划问题。四个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富有应用价值的成果。

1989年，杨开忠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展开了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①在批判地吸收国内外学者有关区域问题研究成果基础上，杨开忠透彻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及其变动趋势，指出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水平的等级关系没有发生变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东部总是相对发达区域，中部总是次发达区域，而西部则是总处在最不发达地位。相应的省区经济水平等级结构的稳定性也是很大的，过去是相对发达的或相对不发达的，现在依然如故。各区域经济普遍增长，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但各区域经济绝非等量扩张。随着人口和国民收入区域间增长趋势的叠加，致使我国以相对综合指标——人均国民收入表示的区域经济差异呈“U”型变化的趋势即6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是缩小的，60年代中期以后则呈扩大趋势与威廉逊倒“U”型理论所揭示的理论趋势相反，这是由于国民收入增长和区域结构变动方向决定的，其中差异性转移增长是区域差异变动的决定性因素。相应我国区域分工从资源—技术型开始向资本—技术型转换，并表现出异质区域间的反市场冲突和同质区域间的一体化行为等这样一系列区域经济运行特征。作为综合主体的区域具有商品生产区位和整体利益的两重性，根据其生产要素的禀赋潜力，可分为同质区域和异质区域。影响区域分工的主要区域因素包括自然资源、人口和劳动力、运输、资本和技术要素等，它们的不同组合构成区域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区域拥有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才是支配区域之间分工的真正法则。同时，在相对成本或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相同或相近的同质区域也能且必须开展分工，与异质区域之间的分工不同，同质

杨开忠.中国区域发展研究,海洋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区域间分工不受比较优势法则支配，而由规模经济法则决定。为了合理地处理总体经济增长与区域公平的关系、促进区域合理发展，国家中央政府必须适应区域分工转型的客观要求，遵循公正、准自由贸易、结构高级化的区际互补、规模经济、补偿五大规则，调整政策、深化改革，建立合理的三级分工体系：①各区域利用劳动资源的国际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②东、中、西部异质区域间的分工；③东、中、西内部同质区域间的分工，从而建立起完整系统的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分工理论。

1992年青年学者蒋岳、刘垠等人利用计量工具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展开了比较研究。①严格说起来这是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数量经济研究，比较分析的内容包罗几乎经济运行中的全部要素和部门，样本既有省区，又涉及地带，还有经济类型区，并对各省区经济实力进行了评价，全面展示了中国各省区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类似的还有刘树成等进行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为揭示中国地区发展差异问题运用了一些诸如基尼系数、结构相似系数等指标，对中国省区差异进行了定量研究。

中国经济的地区差异自始至终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1995年胡鞍钢等发表了他们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②，采用世界银行的分类方法，以人均GDP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将各省区划分为低收入组、下中等收入组、上中等收入组以及高收入组四类地区进行了地区差异问题研究，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认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已是当务之急；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不是扩大而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地区差距的思路不是“压高就低”、“杀富济贫”，而是通过国际通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

蒋岳、刘垠.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比较研究,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年6月版。

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 中国地区差距报告,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年12月版。

共投资重点分配制度，促进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以缩小与全国人均水平的差距，进而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解决欠发达地区问题不是使用计划经济手段维系‘输血’功能而是通过有条件的财政援助和公共投资建立“造血”机制，同时欠发达地区应当学会利用差距利用‘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通过改革和全面开放寻求快速发展。《报告》研究过程中的一系列成果曾一度引起全国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也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以至于在1995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地区差距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并把‘要创造条件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列入当年《政府工作报告》，逐步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方针。

生产力布局历来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宏观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由我国资深经济地理学家刘再兴主编的《中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研究》一书是“八五”期间关于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又一项重要成果。该成果阐述了我国生产力布局的发展演变和理论研究概况，总结分析了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生产力布局上存在的问题、矛盾及形成原因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探索了90年代中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的政策取向，布局的框架构造，并在对中国进行经济区划的基础上，分析各经济大区的比较优势、特点与限制因子，揭示各经济区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塑造以地域分工、区域合作为基础的区域格局，论证了产业合理布局的发展策略，进而着重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布局机制的重塑及改善生产力布局的政策途径，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我国生产力布局进行了论证和勾画。

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研究引入地区协调发展，进而探讨区域发展政策问题孙尚清、李泊溪、魏后凯、周振华等学者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由孙尚清主编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书明确提出了“先富后富 共同富裕 公平竞争 承认不平衡 但

努力消灭绝对贫困；实施空间一体化”的发展战略，重点是通过空间一体化战略，促使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区域结构发生变化；促进以沿江、沿海“T”字型地域为核心的全国地域分工体系的发展。为此，要加快建立统一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强化政府对区域经济的规范化管理。^①随后李泊溪等组织国内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展开了中国区域政策的系统总结和研究，涉及税收、财政、金融和投资等多方面经济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地区间协调发展的战略构想与政策建议，把我国地区发展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青年学者魏后凯和他的同事们就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发表了两本有影响的专著。一是由魏后凯编著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用“失衡的中国区域经济”概括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和新问题，继而探讨了“建立区域经济新格局”的政策途径。二是他和同事们合著的《中国地区发展》，全面探讨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地带、地区与省际间的差异以及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书中分析的样本既涉及地带，又涉及省区，还深入到城市、县和乡村，并采用离差系数、变异系数、锡尔系数、基尼系数以及新古典增长模型等多种方法，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综合考察了中国地区差异的变迁。与《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相比，分析更深入细致，但没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那么简洁明了，给人更明确的地区差距印象。^②在我国资深的经济地理学家陈栋生先生带领下，魏后凯等还把地区研究重心置于中国的西部，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年1月版。

李泊溪等. 地区政策与协调发展,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5年11月版。

魏后凯. 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年7月版。

魏后凯等. 中国地区发展——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地区差异,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年6月版。

表了专论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的学术专著《西部经济崛起之路》，进一步探讨了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的变动趋势、性质与形成的原因，揭示了西部地区崛起的地理动力，一是中央政府加大对西部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二是推进西部之间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协作，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援力度；三是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尽快释放自身发展的潜能，形成自身强大的“造血”功能。为此，西部地区当务之急是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住既有阵地，进一步抢占国内外市场的新滩头，遏制与发达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此举是“慢不得”的。至于历史上形成的地区差距缩小，有赖于长期持续努力逐步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此举是“急不得”的。

中国地区发展差距也引起上海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上海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研究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的《中国经济分析》研究活动，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走过的历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作出全面、系统而客观的理论与经验实证分析，先后推出了《走向市场(1978~1993)》、《企业改制》等专题报告。1995年《中国经济分析》把焦点对准中国地区发展，由周振华主编，出版了学术研究专著《地区发展》，探讨了世纪之交中国地区发展的态势及深层次的体制背景，由此演绎分析了一系列表现中国地区发展特征诸如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行为方式，地区经济增长结构与生产力布局，工业化进程中的省际贸易及政策倾向以及地区利益冲突、地区差距、货币关系与区域金融、收入分配“民工潮”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展望了地区发展前景和发展政策。报告中分析的样本也是基于传统的东、中、西地带以及大区与省区，由于较多地涉及体制、政策因素，研究视角比较新颖。

陈栋生、魏后凯等. 西部经济崛起之路，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周振华主编. 地区发展——1995年中国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由中国区域发展模式进而深入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也逐渐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研究的重点。香港学者赵晓斌、吴荣佳等在 1994 年发表了《中国的区域发展模式 and 中央与地方关系分析》论文，着重从体制尤其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展开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提出了未来中国区域发展的模式。^①翁君奕、徐华的著作《非均衡增长与协调发展》以省区为分析样本，探讨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均衡的替代关系，提出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政策目标，也较多地涉及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的演变过程。^②而周伟林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的论著高度评价了我国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利益这个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基点出发，深刻分析了地方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最终从多元市场到统一市场，完成发展均质化——共同富裕目标的可行性。

1.2.3 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新视角——行政区经济

针对中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块块经济”、“诸侯经济”现象，为了从更深层次揭示中国区域经济运行机制及其规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在刘君德教授的指导下，从行政区划角度切入中国区域经济研究，创立了“行政区经济”理论，并将这一理论运用到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变革的实践中去，合理划分和组织不同类型行政区，从区划体制创新的角度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完整系统地阐述行政区经济理论是刘君德教授主编的《中

^①赵晓斌、吴荣佳. 中国的区域发展模式和中央与地方关系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秋季号总第9期。

^②翁君奕、徐华. 非均衡增长与协调发展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6年2月版。

周伟林. 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版。

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他在长期从事区域地理、人文与经济地理、城市与区域开发、行政区划的研究与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行政区经济”的新概念和理论框架。^①所谓行政区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的纵向运行系统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的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而出现的一种奇特的区域经济类型。^②其所以奇特，是因为行政区经济是以中国国内区域经济的分割为特征，是与国际上地区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悖的一种区域经济。行政区经济在企业竞争中渗透强烈的政府行为，生产要素的跨行政区流动严重受阻，行政区经济呈稳态结构，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高度重合性以及边界经济的衰竭性是行政区经济表现的主要特征，这种经济类型的形成是由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深刻的历史、文化乃至自然因素所决定的；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它最终将逐步向横向系统为主的区域经济过渡。在这种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刘君德和他的学生们展开了有关行政区经济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先后取得了“走向市场经济：中国行政区与经济区关系研究”，“中国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划研究”，“企业扩张——理论研究与应用分析”、“中国城市群区行政组织和管理体制改革探讨”、“上海浦东新区行政区——社区体系及其发展研究”等一系列成果，并适时地将他开辟的研究方向引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指导其学生取得“大都市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以大上海为例”的成果，从而树起了关于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一面崭新学术旗帜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刘君德. 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10月版。

刘君德、舒庆. 中国区域经济的新视角——行政区经济 改革与战略, 1996年第五期。

1.3 研究的框架与思路

中国省区经济研究是行政区经济的理论应用与实证研究，也是人文地理学、区域经济学、行政管理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政治学、城市科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营养的基础上，本研究以中国省区经济为对象，力求发展与创新，全面科学地阐释中国省区经济运行的空间机制。

1.3.1 研究目的

以往有关中国省区经济的研究，一是从区域经济或地区经济角度切入，常常把地区或区域问题混在一起，突出省区经济的个性特征不明显，不能回答当前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各具特色的省区经济问题；二是对区域经济或地区经济的拼盘式研究，区域经济运行的行为主体不确定，一些划定的经济区或者经济地带常常涉及多个利益主体；越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协调管理的成本就越高，区域经济必然偏离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区域经济研究成果难以产生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原因。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研究的目的在于以行政区经济理论为主线，以省区为样本，以“八五”时期即 90 年代以来中国省区经济运行的绩效为对象，进行省一级的行政区经济实证研究，尝试突破省级行政区划形成的无形区域“篱笆”，探讨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与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各具特色的省区经济的政策途径。

1.3.2 研究的基本框架

省区经济运行是指省区经济起飞、成长与发展的时空运动过程。这种运动过程必然受地理分异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规